

【编者按】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升产业发展绩效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产业发展绩效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是传统产业组织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并形成经典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SCP范式。随着学术界对该问题的持续、深入研究，通过增加变量扩展SCP范式的新趋势愈加明显。

不同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其结果呈现较强的异质性，而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还与诸多中介变量有关。本期推出的“‘保护网’还是‘绊脚石’？——种子企业的政府关系资本在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调节分析”一文，建立政府关系资本这一中介变量在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中调节效应的分析框架，并以种子公司为例进行实证检验，识别不同市场结构下政府关系资本对种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为建立政府关系资本视角下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之间研究主题拓展新的思路。

“政府管制”栏目特邀主持人：王俊豪 教授

“保护网”还是“绊脚石”？

——种子企业的政府关系资本在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调节分析

李万君¹，李艳军²

(1.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 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本文从市场成熟度和集中度两个层面分析县(市)区域的油菜种子市场，以此两个变量的高低值进行交互，将区域种子市场划分为初始型、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四类，基于对8家种子公司在8个省(直辖市)136个县(市)区域的287份调查数据，分析不同市场类型中种子公司的市场地位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政府关系资本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除混合型市场外，种子公司的市场地位对经营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政府主导型和混合型市场中，种子公司的政府关系资本在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在市场主导型市场中，政府关系资本正向调节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

关键词：市场集中度；市场成熟度；市场地位；经营绩效；政府关系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2019)02-0105-09

收稿日期：2018-02-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703050)；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7YJA790051)；湖北省技术创新专项(软科学研究类)资助项目(2018ADC06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662015QD003)

作者简介：李万君(1983-)，男，湖北巴东人，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艳军(1963-)，女，湖北仙桃人，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一、引言

已有的研究都认可市场地位与绩效指标之间的关系^[1]，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缺乏量化检验^[2]。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关系资本在日常经营中能帮助一定实力的企业更好地整合现有资源、提升绩效^[3]。对本文重点关注的种子公司而言，政府关系资本在其县(市)区域种子市场的经营中可谓广泛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我国种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营，市场机制并不成熟(李万君和李艳军，2013)，相当一部分种子企业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其前身多为国有种子公司)，还有部分由原种业部门工作人员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经营，这些公司的负责人往往与县(市)区域的农业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实地调查发现，种子公司对政府关系资本的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政府关系资本为企业形成一张全方位的合法的“保护网”，有助于企业增强动态能力、提升经营绩效；有的则认为开发和维系政府关系资本的成本通常是高昂的，需要企业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持续付出；还有的认为政府关系资本的介入往往扭曲甚至破坏市场竞争机制，使被保护企业越来越缺乏市场生存和竞争的能力……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各县(市)区域的农作物种子市场在成熟度和集中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是因为各区域的种植业结构、种植习惯乃至自然环境(如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别，尤其是种业市场放开以后，各区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推行不同的种业发展策略。市场成熟度和集中度的不同可能导致政府关系资本发挥作用的深度和广度千差万别。一方面，种子市场成熟度和集中度不同，表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各异，政府对种子行业的态度和介入力度有所差别；另一方面，上述两个指标的不同，表明市场结构尤其是竞争程度存在差异，势必导致在不同市场中经营的种子企业对政府关系资本的依赖及调用程度差距明显。那么，在这些不同特征的市场中，政府关系资本的效用存在差异吗？对企业乃至种子产业而言，政府关系资本到底是“保护网”还是“绊脚石”呢？这些问题尚待实证检验。

鉴于此，本文基于 8 家种子公司在 8 个省(直辖市)136 个县(市)区域的 287 份经营数据，以市场集中度和成熟度两个指标划分市场，研究不同市场情境中种子公司市场地位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着重考查政府关系资本的调节效应。由于目前关于社会资本(包括政府关系资本)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它在什么情境中以何种程度和什么方式对组织经营发挥作用尚待研究^[4]。为此，本文分析不同市场情境中政府关系资本在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特色和新意。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市场集中度、成熟度和区域种子市场类型划分

市场集中度是分析产业市场结构时常用的概念(Samuelson & Nordhaus, 1998)，一般使用较多的有前 4 位(CR_4)和前 8 位(CR_8)集中度指标(Bain, 1959)。由于在特定的县(市)区域内，从事油菜种子业务的企业数量并不多，因此本文采用前 4 位集中度。市场成熟度囊括市场竞争状态、市场有序程度及市场灵活程度等，是反映市场发展和成熟程度的关键指标(李娟等，2007)。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以县(市)区域市场中完全凭借市场竞争机制成长起来的知名油菜种子品牌来测量所在区域的种子市场成熟度。由于不同县(市)区域油菜种子市场在集中度和成熟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运用以上两个指标的交互将所在区域的油菜种子市场划分为四种类型(见图 1 所示)：

1. 初始型：市场集中度和成熟度都较低。该区域市场中缺乏依靠市场竞争成长起来的种子品牌，不存在规制部门干预和介入以做大某些种子品牌的情况。

2. 政府主导型：市场成熟度低、市场集中度高。该类型区域市场中缺乏由市场竞争成长起来的知名品牌，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一般源于规制力量介入后的培育。

3. 市场主导型：市场成熟度高、市场集中度低。在市场中存在完全依靠竞争成长起来的知名种子品牌，不同的种子品种之间竞争激烈，不存在少数品种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

4. 混合型：市场集中度和成熟度都较高。在市场中存在纯粹依靠市场竞争发展起来的知名种子品牌，但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可能是由于规制部门介入后人为培育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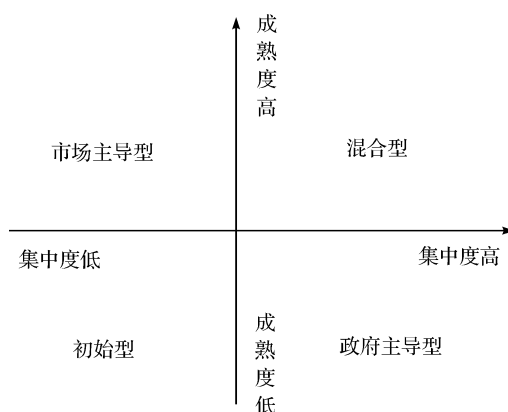


图1 县(市)区域油菜种子市场类型划分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市场地位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市场地位是指企业主营产品在行业中的排列序位^[5]。已有的文献表明市场地位与组织绩效间具有密切的关联^[6]。Smirlock(1985)指出公司的市场地位对其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体现为市场地位高的公司通常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比如，出口贸易中民营企业的市场地位对其贸易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何瑛瑛，2007)；对民营企业而言，市场地位可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来影响其经营绩效(朱茂琳，2014)；还有学者对市场地位导向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持积极态度(吴冰等，2017)。可见，企业的市场地位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确实有着紧密关联。据此，我们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H₁：在初始型市场中，种子企业市场地位对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₂：在政府主导型市场中，种子企业市场地位对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₃：在市场主导型市场中，种子企业市场地位对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₄：在混合型市场中，种子企业市场地位对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政府关系资本的调节效应。政府关系资本是企业与各级政府官员或其他行政管理机构人员建立的关系网络^[7]。有学者认为企业的政府关系资本根据建立方式及性质可分为正式关系资本和非正式关系资本两种^[8]，本文重点研究非正式关系资本，即因熟人关系或私交建立的隐性的关系资本，这种关系资本能为企业在面临经营不确定性时提供一定的缓冲^[9]。具体而言，它有助于企业及时获取有关科技、产品和市场等方面的信息尤其是提前知晓产业内相关的政策动向，这些知识和信息有助于企业更加顺利地开展经营活动^[10]，进而帮助其提升经营绩效^[11]。国内已有的研究也大都支持这一论点(巫景飞等，2008；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耿新和张体勤，2010；龙静和刘海建，2012)。王亚刚等(2010)基于企业自身的实力基础，系统总结政府关系资本发挥效用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的原因^[12]，基本囊括了上述观点。可见，企业的政府关系资本广泛存在和效用发挥影响其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一般都起到强化作用。

但在不同的经营情境中，政府关系资本的效应可能存在差异。比如，在初始型市场中，出于发展油菜种业的考虑，政府部门或许帮扶实力较强的种子企业，因此种子企业的政府关系资本一般有助于强化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在政府主导型市场中，相关部门很可能选择性地扶持部分关系密切的种子企业，此时政府关系资本过多地干扰了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在市场主导型市场中，公平竞争的意识深入人心，政府致力于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此时政府关系资本会强化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在混合型市场中，政府部门依据关系情况对种子市场有一定程度的介入，因而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之间原有的关系更易受到干扰。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H₅：在初始型市场中，政府关系资本在种子企业的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H₆: 在政府主导型市场中, 政府关系资本在种子企业的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H₇: 在市场主导型市场中, 政府关系资本在种子企业的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H₈: 在混合型市场中, 政府关系资本在种子企业的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在长江流域各县(市)区域经营油菜种子业务的公司作为调研对象, 重点考察在湖北省所辖区域市场的经营情况。这是因为长江流域是我国最大的油菜籽产区, 其中又以湖北省为核心(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和产量历年稳居全国第一)。此外, 也是出于尽可能获取高质量数据的考虑。当然, 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本文调研部分种子公司在其他省(市)所辖区域的经营情况。本课题组共进行两阶段的问卷调查, 前后花费两个多月, 发放问卷 400 份, 共调研 8 家种子企业在 9 个省(市)144 个县(市)区域的经营情况, 回收问卷 345 份。因陕西省受访样本的经营绩效存在奇异值, 故予以剔除。经整理后剩余 287 份, 分布于 8 家公司在 8 个省(市)136 个县(市)。有效问卷约占总发放问卷的 71.8%、总回收问卷的 83.2%。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 8 家种子公司在 8 个省(市)136 个县(市)的经营情况, 极易引起外界对样本代表性的质疑。为此, 本文在展开调研设计时已予以考虑并进行相应的控制: 一是在选择调研的种子子公司时, 以公司性质和公司规模进行交互分类, 使调研的样本尽量涵盖不同种类的种子子公司; 二是确定受访种子子公司后, 调研问卷的填写均依据种子子公司在各县(市)经营的客观记录, 尽量减少主观评价。对涉及必须主观评价的语项, 调研者提醒量表的中值 5 对应所在县(市)区域市场的平均水平, 受访者依据该平均水平填答, 以减少评价的主观倾向和非一致性。同时, 上述操作办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各样本间的独立性。

表 1 样本的特征分布

变 量	特征	频数(个)	频率(%)	地区及归属			
公司性质	公有	3	37.5	东部	安徽	36	12.54
	非公有	5	62.5		江苏	2	0.70
董事长年龄	41~50 岁	1	12.5	中部	江西	17	5.92
	51~60 岁	5	62.5		湖北	199	69.32
	60 岁以上	2	25		湖南	19	6.62
					重庆	1	0.35
董事长文化程度	研究生	5	62.5	西部	四川	12	4.20
	研究生以下	3	37.5		贵州	1	0.35
变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业务属地	是	148
注册资本(百万元人民币)	66.88	100.00	5.00			否	139
经营时间(年)	9.13	15.00	2.00				48.4
公司人数(百人)	1.48	4.00	0.20				

以市场成熟度和集中度两个变量的高低取值交互将区域种子市场分为四类。首先分别计算市场成熟度和集中度两个变量的均值, 然后将各样本中市场成熟度和集中度的得分与其均值进行比较, 比均值小的赋值为 0, 比均值大的赋值为 1。如此, 两个变量分别转化为二分变量, 两个二分变量交互后产生四种类型的市场: 初始型(0, 0)、市场主导型(1, 0)、政府主导型(0, 1)和混合型(1, 1)。各类市场包含的样本数及其在总样本中的占比分别为 86(29.9%)、76(26.5%)、70(24.4%)和 55(19.2%)。

(二) 变量的定义、测量与信效度

1. 自变量：市场地位。根据 Kotler(2009)等的研究，本文将种子公司的市场地位定义为其主导品种在特定县(市)区域内的综合市场份额^[5]。基于此，我们将种子公司市场地位设定为其主营油菜品种在县(市)区域内的市场份额。一般而言，当种子公司在某个县(市)区域内经营时，一般对其主营产品在相应区域市场中的占有率进行调查、了解和评价，以确保数据的可获得性。

2. 调节变量：政府关系资本。根据 Peng 和 Luo(2000)、Acquaah(2007)等的研究，本文将种子企业的政府关系资本界定为其与当地农业管理部门的关系^{[7][9]}，并以李克特 9 分量表予以测量。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界定实质上反映了种子企业非正式政府关系资本的内容。耿新和张体勤(2010)在文献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给出企业的政府关系资本较为详细的测量方法，即从网络异质性、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三个方面测度^[3]。本文之所以采用李克特量表予以测量，主要是考虑到政府关系资本的敏感性，因为调查中企业不愿透露其与县(市)区域农业管理部门的关系的详细信息。比如，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中有多少熟人和朋友、企业每月与这些熟人和朋友正式或非正式联系的次数等，这些内容往往被企业认为是敏感话题或隐私而放弃回答。

3. 因变量：经营绩效。尽管所有的公司都面临绩效的界定和测量，但目前并没有一致的办法，基于不同角度的界定和测量，其重点可能不同，这是因为公司在任何层面的产出均可视作绩效(吴正杰和宋献中，2011)。相关文献指出公司的绩效包含公司战略、过程、能力及利益相关者贡献和满意度等五个方面，且这五个方面相互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13]。也有研究指出公司层面的绩效一般可从战略和财务两个维度来测量(Choi et al., 2013; Vorhies et al., 2011)。其中，战略层面与市场份额相关，财务层面则与利润相关(吴建南等，2008)。

经营绩效的界定和测量必须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如公司规模、所属行业等)，因为本文关注的种子企业大多属于中小企业，且所处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已有的研究认为测量中小企业的绩效可侧重于市场和财务两个维度，以避免单一维度测量的不足^[14]。本文拟借鉴这一做法，从市场和财务两个维度来测量种子公司在县(市)区域的经营绩效，市场维度主要包含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等指标，财务维度主要包含销售利润率指标。由于绩效含义的广泛性，为避免测量遗漏，我们认为加入综合维度是必要的，这主要包括经营目标整体达成度和总体满意度等指标。

本文从市场成熟度和集中度两方面分析油菜种子市场，为保持一致性，在测量种子公司经营绩效时也侧重于市场绩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测量经营目标整体达成度和总体满意度时重点考查市场经营方面的状况；二是从财务维度测量种子企业绩效时采用的利润率指标是指销售利润率。之所以如此操作，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市场营销理论认为与市场地位紧密相关的是市场层面的绩效，本文的自变量市场地位侧重于市场层面的绩效，也是与理论框架保持一致的需要；二是对种子企业而言，其他层面的绩效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市场层面的绩效，各企业均将市场绩效视为生命线。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战略维度还是财务维度，包含的指标都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意味着调研中难以获得准确的信息和数据。为此，本文对销量、销售利润率等经营指标也使用李克特 9 分量表予以测量。表 2 给出企业经营绩效各指标的测量语句、因子载荷及整体的信度值。

表 2 公司经营绩效的测量语句及信度检验值

测量语句	因子载荷	Cronbach's Alpha 值
贵公司在该县(市)区域油菜种子经营目标整体达成度(jx ₁)	0.931	0.936
贵公司对在该县(市)区域油菜种子经营的总体满意度(jx ₂)	0.911	
贵公司在该县(市)区域油菜种子销量与当地平均水平相比(jx ₃)	0.931	
贵公司在该县(市)区域油菜种子利润率与当地平均水平相比(jx ₄)	0.794	
贵公司在该县(市)区域油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与当地中等水平相比(jx ₅)	0.895	

首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对种子企业经营绩效量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KMO 检测值

达到0.847, Bartlett球形检验值极为显著($\chi^2 = 1372.849, P < 0.000$),表明样本量足够充分,量表的各语项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因此适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我们运用主成分方法提取一个公因子,命名为种子企业经营绩效,其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9.89%,足够理想。对该公因子做克隆巴赫(Cronbach)信度系数检验后得 α 值为0.936,表明量表的信度很好。

基于文献分析并结合调研访谈,本文采取专家意见法和小组讨论对种子公司经营绩效进行操作化测量,为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测,分析软件为AMOS17.0。检验所得的拟合指标如下: $\chi^2 = 5.04, df = 2, \chi^2/df = 2.52$,介于1和3之间; $P = 0.08 < 0.10, RESMA = 0.073 < 0.10; GFI = 0.993, NFI = 0.996, NNFI = 0.989, CFI = 0.998$,均大于0.9。这表明分析模型与本文的观测值拟合效果较为理想。结构效度包含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两方面。有学者指出收敛效度的高低主要依据三项指标来评判:一是各测量语句的因子载荷值高于0.5;二是潜变量的组合信度高于0.7;三是潜变量的平均提炼方差高于0.5(Hair et al., 2009)。经检验后得知,种子公司经营绩效的组合信度为0.934,平均提炼方差为0.739,结合表2中各语项的因子载荷,潜变量种子公司经营绩效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由于本文只涉及公司经营绩效一个潜变量且仅提取一个公因子,因此无需分析区别效度。另外,量表涉及的题项均借鉴相关专家的操作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其信度和效度。

4. 控制变量。本文还认为公司性质、注册资本、公司人数、经营时间、董事长年龄、董事长文化程度及业务属地(公司业务所在的县(市)区域是否属于其总部所在的省份)等变量都可能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当上述变量的水平存在差异时,也会导致公司在县(市)区域的经营绩效有所不同。因此,为控制这些变量对经营绩效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来分析。公司性质采取公有和非公有的二分变量测量;公司人数、注册资本、经营时间和董事长年龄均以实际值测量;董事长文化程度以是否为研究生的二分变量测量;业务属地也使用二分变量测量。需要指出的是,注册资本和公司人数均属于公司规模变量,同时代入回归模型可能引发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将二者的比值(即人均注册资本)代入模型,后续的回归结果中将报告多重共线性的最小容忍度值,此处不再赘述。

(三) 同源偏差控制与检验

本文的具体受访者一般是种子公司的负责人或区域经理,即同一份问卷中所有题项均来自同一人的作答,由于社会赞许性动机的存在,可能导致所获数据存在同源偏差。为尽量避免这一问题,本课题组采取一系列的应对及处理办法。首先,在问卷设计中,我们尽量减轻受访者的顾虑,使其按照真实情况予以作答。比如,我们一再强调本问卷收集的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其他用途,并承诺严格保密,若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在调研过程中,本课题组严密关注和控制各个环节,以消除同源偏差。比如,在受访者填答时,调研员告知他们问卷各部分用于收集不同方面的数据和信息,事后再独立分析处理。在一部分题目(尤其是量表类题目)答完之后,调研员刻意与受访者交流一些与问卷无关的信息,以防止其将某种倾向性带至下一部分题目的填答中。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获得的样本,本文按已有研究的做法对整个问卷中的量表部分进行哈曼单因子测试,以检验数据收集中可能存在的同源偏差问题的程度。具体做法是对整份问卷所有量表的测量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以检验首因子方差贡献率的高低。检验结果显示,本文中首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仅为21.66%,不存在单一因子能解释大多数方差的问题,表明数据收集中的同源偏差问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四) 数据处理方法

在分析市场地位的主效应及政府关系资本的调节效应时,本文采用多元层级回归法(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予以实现,具体的分析模型为:

$$y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beta_4 X_4 + \beta_5 X_5 + \beta_6 X_6 + \varepsilon_1 \quad (1)$$

$$y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beta'_4 X_4 + \beta'_5 X_5 + \beta'_6 X_6 + \beta'_7 X_7 + \beta'_8 X_8 + \varepsilon_2 \quad (2)$$

$$y = \beta''_0 + \beta''_1 \chi_1 + \beta''_2 \chi_2 + \beta''_3 \chi_3 + \beta''_4 \chi_4 + \beta''_5 \chi_5 + \beta''_6 \chi_6 + \beta'_7 \chi_7 + \beta'_8 \chi_8 + \beta'_9 \chi_{7std} \chi_{8std} + \varepsilon_2 \quad (3)$$

(1) 式是单纯考虑所有控制变量的效应, (2) 式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直接效应, (3) 式是重点分析政府关系资本的调节效应。以上三个模型中, y 代表因变量 (即经营绩效), β_0 、 β'_0 和 β''_0 分别为各回归模型的常数项, χ_1 、 χ_2 、 χ_3 、 χ_4 、 χ_5 和 χ_6 分别代表公司性质、经营时间、人均注册资本、董事长年龄、董事长文化程度及业务属地等控制变量, β_1 、 β_2 、 β_3 、 β_4 、 β_5 、 β_6 、 β'_1 、 β'_2 、 β'_3 、 β'_4 、 β'_5 、 β'_6 、 β''_1 、 β''_2 、 β''_3 、 β''_4 、 β''_5 、 β''_6 分别对应三个模型中控制变量的系数, χ_7 代表自变量 (即市场地位), χ_8 代表调节变量 (即政府关系资本), β_7 、 β_8 、 β'_7 、 β'_8 分别对应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在主效应和全效应模型中的系数, χ_{7std} 、 χ_{8std} 分别为 χ_7 和 χ_8 的标准化值, $\chi_{7std}\chi_{8std}$ 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 β_9 为交互项对应的系数, ε_1 、 ε_2 和 ε_3 分别为各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表 3 显示, 在初始型市场中, 各模型拟合都比较理想, 最小容忍度值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 (2) 表明, 种子公司的市场地位对其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500***), 因而假设 H_1 得到验证。模型 (3) 表明, 市场地位和政府关系资本的交互项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0.053), 因而假设 H_5 未得到验证。

表 3 初始型和政府主导型市场观测值层级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常数项	-0.820* (0.060)	-0.929 (0.135)	-1.036 (0.115)	0.012 (0.989)	-3.827*** (0.000)	-3.177*** (0.000)
χ_1	-0.045 (0.883)	0.133 (0.621)	0.100 (0.717)	0.167 (0.574)	-0.380** (0.050)	-0.285 (0.135)
χ_2	0.199*** (0.000)	0.126*** (0.001)	0.131*** (0.001)	0.120** (0.022)	0.068** (0.029)	0.063** (0.037)
χ_3	-0.447 (0.204)	-0.146 (0.651)	-0.164 (0.615)	0.682 (0.237)	0.205 (0.529)	0.235 (0.456)
χ_4	-0.616** (0.026)	-0.370 (0.133)	-0.355 (0.154)	-0.783** (0.042)	0.405* (0.094)	0.184 (0.462)
χ_5	0.885** (0.026)	0.481 (0.187)	0.507 (0.171)	0.564 (0.185)	0.552** (0.024)	0.551** (0.020)
χ_6	-0.302 (0.215)	-0.504** (0.022)	-0.504** (0.023)	-0.553** (0.040)	-0.879*** (0.000)	-0.751*** (0.000)
χ_7		3.500*** (0.000)	3.261*** (0.000)		1.645*** (0.003)	1.689*** (0.002)
χ_8		0.006 (0.892)	0.018 (0.729)		0.506*** (0.000)	0.453*** (0.000)
$\chi_{7std}\chi_{8std}$			0.053 (0.600)			-0.271** (0.021)
R^2	0.459	0.594	0.595	0.175	0.750	0.769
调整后的 R^2	0.418	0.551	0.547	0.103	0.720	0.737
F 值	11.185*** (0.000)	14.065*** (0.000)	12.415*** (0.000)	2.435** (0.034)	25.058*** (0.000)	24.409*** (0.000)
最小容忍度值	0.229	0.206	0.202	0.367	0.359	0.358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此。

同样地, 在政府主导型市场中, 各模型拟合都较好, 最小容忍度值显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 (5) 表明, 种子公司的市场地位对其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645***), 因而假设 H_2 得到验证。模型 (6) 显示, 种子公司的政府关系资本在其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0.271**), 因而假设 H_6 得到验证。

表 4 显示, 在市场主导型市场的回归中, 各模型也拟合得较理想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 (8) 表明, 种子公司的市场地位对其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054***), 因而假设 H_3 得到验证。模型 (9) 显示, 种子公司的政府关系资本在其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0.408**), 因而假设 H_7 得到验证。

同样地, 在混合型市场中, 各模型也拟合得较理想。模型 (11) 表明, 种子公司的市场地位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0.501), 因而假设 H_4 未得到验证。模型 (12) 表明, 市场地位和政府关系资本的交互项对公司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0.271**), 因而假设 H_8 得到验证。

表4 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市场观测值层级的回归结果

变 量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常数项	-0.412(0.438)	-2.380**(0.014)	-1.948**(0.046)	0.138(0.929)	-3.817*** (0.000)	-3.082*** (0.001)
X ₁	-0.506*(0.093)	-0.029(0.928)	-0.115(0.715)	-1.033** (0.039)	-1.436*** (0.000)	-1.314*** (0.000)
X ₂	0.156*** (0.000)	0.198*** (0.000)	0.135** (0.026)	0.176*(0.082)	0.090*(0.080)	0.109** (0.036)
X ₃	-0.850** (0.037)	0.080(0.865)	-0.328(0.526)	-1.117(0.332)	-1.544*** (0.009)	-1.470** (0.011)
X ₄	-0.231(0.431)	-0.528*(0.072)	-0.314(0.312)	0.032(0.966)	1.460*** (0.000)	1.065** (0.018)
X ₅	0.891*** (0.037)	1.209*** (0.006)	0.877*(0.060)	-0.805(0.328)	-0.764*(0.060)	-0.809** (0.043)
X ₆	-0.503*(0.074)	-0.940*** (0.002)	-0.631*(0.064)	0.184(0.682)	-0.560** (0.021)	-0.297(0.292)
X ₇		2.054*** (0.007)	1.572** (0.047)		0.501(0.327)	0.692(0.180)
X ₈		0.228*** (0.010)	0.244*** (0.006)		0.493*** (0.000)	0.455*** (0.000)
X _{7std} X _{8std}			0.408*(0.079)			-0.225*(0.098)
R ²	0.432	0.520	0.545	0.178	0.818	0.829
调整后的R ²	0.378	0.458	0.476	0.075	0.786	0.795
F值	7.977*** (0.000)	8.274*** (0.000)	7.974*** (0.000)	1.732(0.134)	25.848*** (0.000)	24.217*** (0.000)
最小容忍度值	0.348	0.187	0.120	0.312	0.295	0.293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文献分析和实地访谈构建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以市场集中度和成熟度两个指标划分县(市)区域油菜种子市场,运用多元层级回归方法,分析每一类市场中公司市场地位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考查政府关系资本的调节效应,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公司的经营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市场地位。结合市场地位的含义,不难得出企业在实践中拥有优良的产品才是经营获胜的根本保障,即只有拥有优良的产品,公司的经营活动方可取得满意的效果。因此,对本文中的种子公司而言,要获得生存和发展,必须研发并培育高质量的品种、提高产品的市场地位,而不是舍本逐末。

第二,在政府主导型和混合型市场中,政府关系资本在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政府关系资本在这两种情境中干扰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即对市场地位较低者而言,政府关系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网”的作用,但反过来看,它无疑又成为市场地位较高者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干扰效应势必扰乱市场竞争机制。对种子产业而言,它阻碍相关区域种子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国家打造“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集团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关系资本在这两种情境中成为种子产业健康发展的“绊脚石”。

第三,政府关系资本在市场主导型市场中正向调节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间的关系,表明政府关系资本对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帮助,尤其是对市场地位较高者的短期经营活动而言,它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发展的“保护网”。但政府关系资本的介入稍有不慎就走向另一端,即人为促进种子市场的马太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使市场地位较低者难以打破稳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获得发展空间和机会,因而对种子产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极为不利。

可见,在不同的市场情境中,政府关系资本的效应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政府关系资本是“保护网”或“绊脚石”,应视具体对象和情境而言。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政府关系资本无疑是种子公司乃至种子产业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因为在某些情境中,对特定市场地位的企业而言,政府关系资本对其经营绩效提升具有一定的帮助,但这可能是建立在破坏市场竞争机制、伤害竞争对手利益的基础上的。企业的政府关系资本积累和调用往往与政府寻租有着很大的关联^[15],过度依赖政府关系资本的庇护并不利于其培育竞争优势(郑山水,2015)。由于企业的竞争力直接关系到整个产业的竞争势能,而且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阻挡和逆转的趋势,因此种子企业广泛寻求政府关系资本的庇护必定进一步影响到种子产业的竞争力。可见,种子公司依赖政府关系资本无论对竞争对手

还是对自身乃至整个种子产业发展来说都具有消极的影响。对企业而言,无论市场地位高低,都应逐渐从政府关系资本的庇护下走出来,树立市场竞争意识并公平参与竞争;对政府有关部门而言,在种子产业发展中,除做好必要的引导和服务工作外,尽量避免干预种子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参考文献:

- [1] 李万君. 种子企业参与统一供种项目的意愿、行为与绩效研究 [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 [2] Jung S., Zhu J., Gruca T. S. A Meta-analysis of Correlations between Market Share and Other Brand Performance Metrics in FMCG Market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12): 5901–5908.
- [3] 耿新, 张体勤.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以组织宽裕为调节变量 [J]. *管理世界*, 2010, (6): 109–121.
- [4] Witt P. Entrepreneurs' Networks and the Success of Start-ups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4, 16(5): 391–412.
- [5] Kotler P., Keller K. L., Brady M., Goodman M., Hansen T. *Marketing Management* [M].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9.
- [6] Cynthia A. M., Birger W. Sources of Superior Performance: Market Share Versus Industry Effects in the U. S. Brewing Industry [J]. *Management Science*, 1991, 37(8): 954–959.
- [7] Peng M. W., Luo Y. D.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3): 486–501.
- [8] 余颖, 伍青生, 汤凌冰. 同行竞争者合作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企业的政府关系与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6, (3): 108–115.
- [9] Acquaaah M. Managerial Social Capit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an Emerging Econom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12): 1235–1255.
- [10] Adjibolosoo S. *The Human Factor in Developing Africa* [M]. Westport, CT: Praeger, 1995.
- [11] Lane P. J., Lubatkin M. Relativ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19(8): 461–477.
- [12] 王亚刚, 席酉民, 荣卫东. 企业政府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战略创新研究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10): 98–107.
- [13] Kaplan R. S., Norton D. P. The Balanced Scorecard: Measures that Drive Performance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2, (1): 172–180.
- [14] 邓新明. 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多元化战略与公司绩效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1, (4): 4–15.
- [15] Galang R. Victim or Victimizer: Firm Responses to Government Corruption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2, 49(2): 429–462.

“Cradle” or “Obstacle”?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ed Enterprises' Government Relations Capita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Position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LI Wanjun¹, LI Yanjun²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divides the seed market of county(city) areas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initial market, the government-led market, the market-oriented market and the mixed market according to the two indexes, i. e. market maturity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market position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relations capital in different types of the market based on 287 copies of data from 8 seed companies' operating conditions in 136 counties (cities), 8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seed company's market posi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in all types except the mixed market; government relations capital play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position and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in government-led and mixed markets; but in the market-oriented scenario,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relations capital in this relationship i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Key words: Market Concentration; Market Maturity; Market Position; Operating Performance; Government Relations Capital

(责任编辑: 化 木)